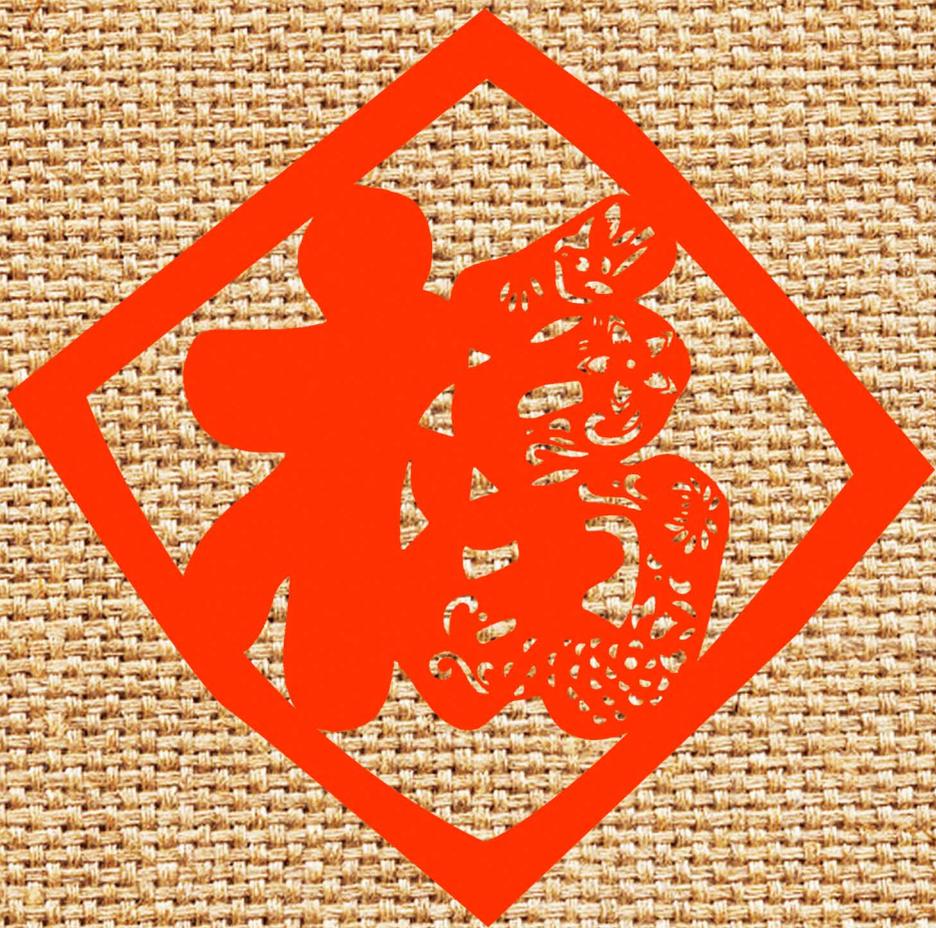


民生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中国幸福之路

韩跃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探讨在当代中国如何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著作。作者在综合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对幸福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幸福概念、幸福测度等基本理论，并根据近年我国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参照国外的研究经验，按照相关性排序列出若干增进我国国民幸福感的路径，分别予以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说明这些路径与幸福提升的内在关联；呈现相关领域仍然存在的制约人们幸福感提升的社会问题；并从国家维度，兼及个人维度为人们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出谋划策。

“民生中国”书目

- 《转型中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深层破冰》
- 《新医改的公益性路径》
- 《破解中国社会保障的困局》
- 《中国农业发展难题破解》
- 《中国农民工的未来》
- 《解开束缚中国居民消费的绳索》
- 《中国人口之殇》
- 《中国教育问题求解》
- 《中国大学面临的选择》
- 《中国大学生就业痛与搏》
-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反思》
- 《中国制造业向何处去》
- 《中国生态环境的困局与未来》
- 《盛世中国的治与安》
- 《大国食安》
- 《中国幸福之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幸福之路 / 韩跃红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1

(民生中国)

ISBN 978 -7 -5415 -6414 -7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幸福 - 研究 - 中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069 号

出版人 李 维 李安泰
策划组稿 李安泰 杨云宝
责任编辑 杨云宝
整体设计 高 伟
责任印制 张 旻 赵宏斌 兰恩威

民生中国·中国幸福之路

韩跃红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eph.com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7 -5415 -6414 -7
定 价	27.00 元

总 序

宋晓梧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实的政治定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提出了“图谋民生幸福”的目标，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目标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时隔100周年，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一中
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不会动摇，新一轮的发展将更侧重为民谋福祉。他指出：“我们
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
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向往作
为工作的目标，把人民的期待作为工作的动力，表明新一届领导核心
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
一起继续创造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改善民生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放到一起，专列一篇（第八篇），明确“十二五”时期民生和基
本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
口计生、住房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提出要
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一五”时期，我国民生领域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24% 的县，约 1.4 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从 4 亿人扩大到 8.35 亿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无到有，加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4.32 亿人；企业职工连续 7 年提高退休待遇水平，年均增长 10%；大幅度提高了教育投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建立相关的民生绩效管理机制。

财政部在 2011 年预算草案报告中提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这三个方面投入的增长幅度都高于 16%，住房保障方面也达到 14.8%，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 2011 年 8% 的 GDP 预期增长幅度。如果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将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 年，我国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 29.7%，比人均 GDP3000 美元以下的国家平均低 13 个百分点，比人均 GDP3000 美元至 6000 美元的国家平均低 24.3 个百分点。现在我国国力增强了，这两年也加大了对保障民生方面的投入，如：2011 年人均卫生公共服务经费标准由 15 元提高到 25 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人均 120 元提高到 200 元；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工矿、林区、垦区等棚户区改造，2011 年达 1000 万套，改造农村危房 150 万户，等等。但从总体看，财政加大对民生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还是有较大增长空间的。

改善民生，投入很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结构问题。而调整结构，有待于相关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关机制的完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存在逆向转移问题，即一次分配的差距，经过基本公共服务二次分配后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种逆向转移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应当扭转这种逆向转移的趋势，在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要实行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后发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结构

调整还要求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财力关系，调整城乡分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关系，调整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关系。显然，完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先举一个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企业与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由1990年的1:1.21不合理地扩大到2005年的1:2.1。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投入不算少了，但仍难以平衡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待遇水平的相互攀比。2011年“两会”后，我在云南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经连续7年提高待遇后，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养老金不到当地一般小学教师退休养老金的50%。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出发，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要再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不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其他补充保险来体现。美国1984年、日本1986年统一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又有一些国家实行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远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历史上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与政府和事业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分开搞两三套养老保险制度，给社会平添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矛盾和纠纷。“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因改革方向不明确，其推进步履维艰，建议“十二五”时期启动并完成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再举一个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十一五”时期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实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这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充分肯定。“十一五”时期，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前一阶段各地偏重总量GDP或人均GDP指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经过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社区卫生机构覆盖率，2007年一些地区达到100%，而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到30%；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2007年上海、北京、天津与江西、贵州、河南等地比，差距达4~5倍，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提高到

30 万元，西安 5 万元，南昌 3 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2009 年，广东 10.04%，辽宁 23.92%，而抚养比广东 12.14%，辽宁 44.5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还会向发展条件较好、回报率较高的区域集聚，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以人均 GDP 大体相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十分困难和相当遥远的事情。因此，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大大弱化 GDP 指标，突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要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首先，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按照均等化的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制度，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促使政府履行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考虑建立相关绩效管理机制。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从 2005 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了要“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加快实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2011 年以来，国家监察部成立了绩效管理监察室，国家建立了国务院绩效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我国的绩效管理的试点和推进工作。

但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任务转换为具体的绩效考核目标，并与官员的升降奖惩结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课题。长期以来，绩效考核的目标过于偏重 GDP，这有其历史的原因。现在，民众的诉求更强调保障民生和公共服务。因此，绩效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加以改进，将“1E”（经济）导向转变为“4E”导向，即经济性（Economy）、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

ciency)、效益性 (Effectiveness), 用“民生指数”代替“GDP崇拜”, 并实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 领导评价和公众评价相结合。

尤其要重视外部评价和公众评价。民生改善如何, 民众感受最深。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讲话中所说,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要大力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满足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过程、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和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热情。公众参与不仅有利于培育群众的公民意识, 也有利于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建立公众导向、民生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 有助于把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变成政府实实在在的基本职能。

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侧重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这样的情形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民生中国”系列丛书意义重大。这套丛书是一套大型公益性著作, 是反映中国民生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 这套丛书选题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编者对民生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 选题规模宏大, 同时重点突出。客观上说, 策划出版这么一套大型丛书是有难度的, 学科跨度很大, 作者天南海北。民生问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等学科, 该丛书作者或者是国内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或者是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阵容可谓强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作者基本都有社会调查阅历以及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的机会, 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有战略思维, 又熟悉政策, 能接地气, 这就有可能出精品。这套丛书可以作为广大干部思考、破解中国民生难题的政策工具书, 也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参考书。

第二, 这套丛书在民生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诸多理论创新, 为我们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分析和建议。研究中国民生问题, 既要在已有理论和政策话语下展开讨论分析, 也需要在此基础上

有新的思考、探索和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落实，必须以满足民生发展需求为评判标准。这套丛书从民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和界定了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既连着内需，连着转型，也连着公平，所谓民生问题，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物质福利的改善问题。民生发展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纠正社会初次分配不公，进行二次分配和公共财政体系的制度改革。但民生发展更需要重视发展中的非物质因素，如公平、正义、宽容、自由等等，需要从维护广大群众最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丛书所涉及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所提出的相应政策建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2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幸福的测度：幸福感和幸福指数	19
第一节 幸福是什么	19
第二节 国民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24
第二章 幸福的基座：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	31
第一节 “幸福—收入悖论”	32
第二节 公平正义与国民幸福	38
第三节 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48
第三章 幸福的源泉：尊严生活与体面劳动	60
第一节 “人的尊严”的三个层面	61
第二节 从尊严到幸福	67
第三节 追寻有尊严的幸福	74
第四章 幸福的港湾：温馨家庭和社会保障	79
第一节 家庭温馨幸福全家	80
第二节 社会保障保幸福之“底”	84

第五章 幸福的路径：渴求、奋斗、满足及社会价值的实现	96
第一节 渴求是幸福之路的灯塔	97
第二节 奋斗是通往幸福的桥梁	99
第三节 学会满足才会有幸福	102
第四节 努力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105
第六章 幸福的境遇：生态优美与人际和谐	108
第一节 生态优美是幸福的自然境遇	109
第二节 人际和谐是幸福的社会境遇	123
第七章 幸福的底线：身心健康和尊崇道德	133
第一节 健康成就幸福	133
第二节 美德提升幸福	146
第三节 健康伦理：健康与道德在这里贯通	157
第八章 幸福的愿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163
第一节 自由发展通往幸福	165
第二节 全面发展拓展幸福	171
第三节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	174
参考文献	182
后 记	184

绪 论

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向往和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正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说：“人类刻苦勤勉的终点就是获得幸福，因此才有了艺术创作、科学发明、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的变革。”财富、地位、声望、知名度及其他目标都不能和幸福相比，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名望上的追求，其最终都是追求幸福的手段。

相信很多读者都读过哈佛大学泰勒·本-沙哈尔博士（Tal Ben-shahar, PH.D.）的《幸福的方法》，并为之感动。这本小书是他积极心理学课程的讲稿，该课程一举登上哈佛大学最受欢迎课程排名榜首，远播全球，成为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境遇的人生之路上的一面镜子。人们在读这本书时，仿佛是在读自己，借助这面“镜子”，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自己不快乐、不幸福的原因，禁不住潸然泪下。当他们抹去泪水，却再也抹不掉下面的文字：“我认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一个高于其他所有目标的总目标……我提出，幸福才应该是至高的财富，而金钱和声望绝不是用来衡量生命的标准。”幸福“是所有目标的终点站”。“幸福在所有目标中是至高无上的，其他所有目标的终点都只是去往幸福的起点。”泰勒·本-沙哈尔博士的著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类大家庭确实存在共同的价值。我们可以对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唯独不能对追求幸福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不想把宝贵的一生与

幸福结伴，没有人来到世间是为了追求痛苦和不幸，只是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而已，但追求幸福却是人之共性。在人类共同认可的诸多价值中，端坐于塔顶、统摄所有价值的终极价值是幸福。

然而，幸福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国家的制度、政策、法律等等政权手段都不能偏离人民福祉的方向。早在古罗马时期，其《十二铜表法》就将法律最根本的价值表述为：人民的幸福是最高法律。法国1793年宪法宣布“社会的目标是普遍幸福”。在美国，杰弗逊将追求幸福写入独立宣言，一半以上的州宪法中也有相同提法。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誓词中明确提出，“图谋民生幸福”。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则因宣称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少痛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他甚至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写作关于幸福的科学，认为政府通过恰当的计算能够衡量公共政策所带来的预期幸福和痛苦，从而可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幸福的方案。不丹是目前唯一正式采用人民幸福作为政府施政目标的国家，不丹的“幸福新政”理念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原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宣布，要将国民福利作为一项衡量整个国家发展的标准。在英国，首相的战略研究机构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将幸福指标纳入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报告，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宣称：“我们应当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在人民的口袋里放更多的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的心中有更多的欢乐。”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考虑除了通常的经济衡量方法之外，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府绩效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总之，每个人都在为幸福而努力，每个家庭都在悉心呵护家人的幸福。市民拥戴市长是因为他促进了他们的福祉，国民爱戴领袖是因为“他为人民谋幸福”，人们紧紧依偎、不愿离弃祖国是因为那里有他们幸福的家园。一个具有很高国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和国民凝聚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像一列驶向现代化的高速列车，一直在奇迹般地奔驰。坐在车上的人都急切地盯着前方的目标（功名、地位、财富、荣誉），列车长和司机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劲，带领乘客奔向一个又一个目的地——脱贫、温饱、小康、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中等发展中国家、大国崛起、振兴中华……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无比珍惜和平发展的机遇，以遗忘个人享受为代价，拱起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创造了

GDP 增幅年均 9.6% 的“中国奇迹”，使国家经济总量在 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达到 4382 美元。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幸福感与财富俱增的状态渐渐趋近于尾声。眼看着温饱解决了，全面小康指日可待，但连续三十多年的竞争拼搏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身心疲惫，甚至导致一些人心灵空虚；日趋拉大的贫富差距削弱着因财富增加而带来的幸福感受；各种社会矛盾、安全事故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时代”；健康、休闲、自由、对未来的把握、家庭稳定、人际和谐、心情舒畅、体面尊严等等与人的幸福密切相关的东西日渐成为生活中的稀缺品。于是，幸福，这个凝结着许多时代课题的话题，几乎是以一种呐喊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登上了学术殿堂。早在五六年前，有关幸福的著述还寥若晨星，那是极少数先觉者在挑灯先行，但 2008 年以来，这类著述突如泉涌，各地的幸福研究机构、幸福论坛也有如雨后春笋。

环顾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之后，都要经历社会问题迭起、社会矛盾丛生的考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致富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那时财富与幸福几乎结伴而升。改革开放 30 年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还将以年均 7% 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但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财富还有昔日的魔力吗？当人们终于明白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财富、功名不过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后，幸福理应取代财富，成为今后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同时，国家也应顺应民心，全面回归“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诉求。

回眸过往，传遍全球的《国际歌》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由于黑暗的旧中国完全丧失了人们创造幸福的社会条件，才唤起中国的仁人志士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中国人民唱着《东方红》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他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近代中国从山河破碎到重整河山，从积弱积贫到温饱小康，一路走来，历尽坎坷，尝遍艰辛，终于在 21 世纪的开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启之年，豪迈地扬起了驶往幸福彼岸的风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1 年 1 月，广东省率先把“幸福广东”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二五”时期，“必须承前启后抢抓科学发展战

略新机遇，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个核心，全面开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新局面”。重庆市也紧随其后，提出要把该市打造成“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以及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相继开展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调查评选活动。山东作为一个拥有 9400 多万人口的发达省份，在 2011 年开出了 26 项“民生大单”，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幸福山东”的打造。2011 年 7 月 12 日晚，深圳大剧院隆重举行了第二届“幸福深圳”DV 大赛颁奖晚会，同时启动下一届大赛，这不过是借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之机，掀起“偶爱大运，幸福深圳”的系列活动之一。2011 年 9 月 1 日，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开学第一课》正式启动，其主题是“幸福在哪里”，全国中小学生在这一天共上“幸福”第一课。国家旅游局将在“十二五”期间颁布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截止 2012 年 10 月，全国已有 18 个省市区、100 多个城市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之一。显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已经下决心告别唯 GDP 论，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生改善。以上一系列的政坛信息和民间活动，都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普遍希冀和追寻正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层面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等大政方针正在与人民追求幸福的热情相契合。幸福，忽如一夜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我们注意到，2012 年 11 月 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幸福”一词出现了四次。细察每一次“幸福”的表意，它都是处在目的或价值的层面。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且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人们才能“幸福安康”；十八大报告长达 2.8 万字，最后的结束语是：“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而奋斗，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①由此可见，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最终目标。

幸福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就必然成为人类永恒的话题。纵览人类思想长河，西方素有探讨幸福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中世纪被宗教禁欲主义所打断。文艺复兴以降，幸福一度成为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并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延伸到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当看到物质财富和心理治疗并不能保证人们的幸福感随社会发展而增加的问题之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甚至于脑科学也加入到对幸福的研究之中。这些研究分别从价值观和人生观引导、经济发展、心理调适、制度调整、法律规范、社会建设、员工管理，甚至于从发明某种引起快乐的药物或生物技术出发，来为疲于奔命的现代人开具“幸福的处方”，于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史上，幸福话题成为装点众多学科的美丽“花朵”，一方面给竞争高压下的人们带来精神抚慰，另一方面，也在引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朝向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囿于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它是否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同步增进的难题，不仅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持否定态度，今天身处发达国家的一些未来学家也表达出某些怀疑和悲观的思想倾向。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迥异于西方。只有先秦时期的先哲们对幸福有过一些质朴言论，但随着封建集权制度的形成，幸福话题很快凋敝，被淹没在以道德主义、禁欲主义、集体主义为主流的文化大河之中，成为星星点点、迂回曲折的快乐散论。幸福探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之所以如此冷落、如此“羞涩”，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民众因自谋幸福而难以被驯服的社会局面，都希望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成为“臣民”们永远不变的心态。近代中国战乱纷纷，救亡图存的烽火此起彼伏，更不可能出现探讨幸福的热潮。国内对幸福问题的集中研究恐怕晚至改革开放之后，甚至可以被视作从“经济收益阶段”进入“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后的产物。^②就目前而言，国内

^① 《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5版。

^② 国际研究幸福问题的著名学者英格爾·哈特认为：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国家将从“经济收益阶段”进入“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在前一阶段，福祉随着经济增长明显提高，而在后一阶段，经济增长对福祉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即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主观幸福感和GDP的增长就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幸福的研究以转介国外研究理论以及对特定区域、人群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调查居多，以陈惠雄为代表的“快乐经济学”已有二十多年令人瞩目的研究。

中外历史上诸多关于幸福的著述有助于我们循着人类先哲的足迹，走到当下时空，更加完整地理解人类幸福——这一古老而又恒新的话题，更加全面地探寻中国的幸福之路。

欧洲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属于人类文明的童年，两种文化都带有童年时期的特征：自然、质朴、天真，它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能够更多地遵从人类自身的感受和经验来阐发对幸福的理解，所以，那时的先哲们大多把幸福与快乐联系起来，甚至于把二者直接同一。由于快乐可以来自于感觉器官的满足（食、声、色、味、性等），也可以来自于超越于感官快乐的某些纯粹精神层面的满足（行善、受人尊敬、发明创造等），因而，基于人类共同经验和真实感受而表达的古典幸福论呈现为感性幸福观与理性幸福观的大致分野。相对而言，感性幸福观比较看重感官的快乐和物质方面的享受。例如，古希腊昔兰尼学派将感觉作为幸福的唯一来源。他们认为，感觉是最真实的，人们除了能够感觉到快乐和痛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感觉到的东西了。因此，他们将追求感官快乐作为最大的幸福，“快乐即使是从最不光彩的行为中产生的，也是善的。”^① 墨子没有这般极端，但也强调与物质不可分割的感官满足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他指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② 在西方，感性幸福论附和了奴隶主贵族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心理需求，为它们骄奢浮华、淫乱无度的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引起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批评，产生出强调理智对欲望的约束和主张道德对幸福、快乐具有决定意义的另一阵营——理性幸福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古典理性幸福论者都远远多于感性幸福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庄子等都认为，单纯追求感官和物质的享乐会导致人性堕落和道德败坏，只有那些高尚的理性行为如学习、教育他人、行善、助人、交良友等，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正如柏拉图所言：“吃喝等肉欲的快乐，好像笨重的负担。从这些恶徒出生

^①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② 墨子：《墨子闲诂·附录》。